



世纪前沿

**Taming Globalization**  
**Frontiers of governance**

[英] 戴维·赫尔德等 著

David Held et al.

童新耕 译

# 驯服全球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驯服全球化

[英] 戴维·赫尔德等 著 童新耕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驯服全球化:管理的新领域 / (英)赫尔德(Held, D.)等著;

童新耕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Taming Globalization: Frontiers of Governance

ISBN—7—5327—3501—X

I. 驯... II. ①赫... ②童... III. 经济一体化—研究

IV. F114.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2647 号

图字:09—2003—49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责任编辑 沈志彦

装帧设计 陆智昌

---

**驯服全球化**

——管理的新领域

[英]戴维·赫尔德等 著

童新耕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11

插 页 4

字 数 140 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3501—X/F·160

定 价 22.00 元

##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 编者序

本书的各章（前言及第六章除外）均为 2002 年 1 月至 6 月，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米利班德全球经济管理讲座 (Miliband Lectures 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所作的讲演的修改文本。作为这几次讲座的组织者与本书的编辑，我们增添了一个前言和最后一章，以帮助提供背景情况和更好归纳论点。

本系列的米利班德讲座专注于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之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与人类发展条件的关系，社会正义与民主问责制的关系。我们认为，通过从各个角度对这个关系的探索，讲演者已勾勒出一份有影响的改革现有的全球经济管理体制的议程表，他们的想法和建议理应为更广泛的公众听证。

米利班德讲座让人怀念从 1949 年起到 1972 年一直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执教的拉尔夫·米利班德先生。他的工作所致力研究的问题十分接近于本书的主题：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管理的关系，经济与政治权力的联系，以及以一个更加平等与民主的秩序替代现有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随着全世界的学者和公民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后果的辩论的展开，我们认为他所关心的问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我们关系紧密。

米利班德计划 (The Miliband Programme) 的资金来源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一位前博士生的一份丰厚的馈赠。他曾深受拉尔夫·米利班德的批判眼光的启发。这份馈赠使得这个讲座系列得以可能。在此我们谨向支持我们的工作的所有人，特别是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弗莱德·哈利迪 (Fred Halliday)、亨里埃塔·莫尔 (Henrietta Moore)、马里恩·科扎克 (Marion Kozak)、戴维·米利班德 (David Miliband) 和爱德华·米利班德 (Edward Miliband) 致以万分感谢。我们也十分感谢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全球管理研究中心为大本营的全球问题计划 (Global Dimensions Programme) 的支持，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支援。

D·赫尔德及 M·K·阿奇布吉

## 作者介绍

罗伯特·古丁 (Robert E. Goodin)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学院社会和政治理论及哲学教授。他是《政治哲学杂志》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的创始编辑, 著有多本著作, 包括《保护弱者》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1985), 《福利的理由》 (*Reasons for Welfare*) (1988), 《绿色政治理论》 (*Green Political Theory*) (1992),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公共哲学》 (*Utilitarianism as a Public Philosophy*) (1995), 与戴维·施米茨 (David Schmidtz) 合著的《社会福利作为一种个人责任: 赞成与反对》 (*Social Welfare as a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For and Against*) (1998), 与黑德 (B. Headey)、穆费尔 (R. Muffels) 和德文 (H.-J. Dirven) 合著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真实世界》 (*The Real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1999)。他与人合作, 联合编辑的主要参考书籍有: 《当代政治哲学指南》 (*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及该书的续编《当代政治哲学文选》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Anthology*), 上述两书均与菲利普·佩蒂特 (Philip Pettit) 联合编辑 (1993 年和 1997 年), 以及与克林曼 (Hans-Dieter Klingemann) 合编的《政治学新手册》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6)。

戴维·赫尔德 (David Held)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著有《民主和全球秩序: 从现代国家到世界的治理》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1995), 《民主

的模型》(*Models of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 1996), 与人合著的有《全球性转变: 政治、经济和文化》(*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1999), 编辑或与人联合编辑的有《民主的前景: 北南东西》(*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orth, South, East, West*) (1993), 《世界民主: 新世界秩序的进程》(*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 Agenda for a New World Order*) (1995) 及《重新设想政治共同体》(*Re-imagining Political Community*) (1998)。

罗伯特·基奥恩(Robert O. Keohane) 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霸权之后: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和冲突》(*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1984), 此书为他赢得1989年第二届年度格拉韦美改进世界秩序创意奖(Grawemeyer Award in 1989 for Ideas Improving World Order)。他还著有《国际机构和国家权力: 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1989)。与人合著的有:(合作者 Joseph S. Nye Jr.) 《权力和独立: 转变中的世界政治》(*Power and In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third edition 2001) 及(合作者 Gary King 和 Sidney Verba) 《设计社会不平等: 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断》(*Designing Social Inequalit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1994)。他的最新的著作是《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和管理》(*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2002)。他是国际研究协会的主席(1988—1989)和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1999—2000)。

马塞厄斯·柯尼希-阿奇布吉(Mathias Koenig-Archibugi) 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写过诸多有关全球管理、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化的国际方面及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整合等方面的文章和书的章节。

约翰·杰勒德·鲁吉(John Gerard Ruggie)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

院国际事务教授和商业和政府中心主任。从1997年起到2001年，他是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秘书长助理及首席战略规划顾问。他的主要职责包括设计和管理科菲·安南旨在提高全球公司惯例中的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原则的“全球协议”。在准备安南向联合国千年峰会所作的题为《我们人民：21世纪的联合国》的著名的报告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已出版6本著作，包括《赢得和平：新时期中的美国和世界秩序》（*Winning the Peace: America and World Order in the New Era*）（1996）及《构建世界政治》（*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1998）。他在世界各地所撰写的专栏文章和电视评论更是不计其数。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金融和国际事务教授。2001年被皇家瑞典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教授为经济理论的每一个分领域——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国际经济学、劳工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有贡献。他当过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以后又出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罗伯特·亨特·韦德（Robert Hunter Wade）**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曾在维多利亚学院、苏塞克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布朗大学任教。他还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拉塞尔圣贤基金会（纽约）和（柏林）高级研究院的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他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经济学家，以后又任职技术评估办公室（美国国会的一个部门）的分析师。他著有《韩国的灌溉和农业政策》（*Irrig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litics in South Korea*）（1982），《乡村共和国：南印度集体行动的经济状况》（*Village Republics: Economic Condition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South India*）（1988）和《管理市场：东亚工业化中的经济理论和政治作用》（*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1990)。后者获得了美国政治学学会最佳政治经济学著作奖(1989—1991 年度)。他还为《经济学家》杂志写过一篇关于世界收入分配结构起源和后果,以及改进国际公共政策的特邀论文(2001 年 4 月 28 日)。

## 前言：

# 全球化和对管理的挑战

马塞厄斯·柯尼希-阿奇布吉

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化”已经成为一块透镜，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商人、记者、学者和公民透过它来观察和理解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世界。中美洲血汗工厂中的工人，东帝汶的人权积极分子，过渡经济中的企业家，北极家园正受到全球变暖威胁的因纽特人（即爱斯基摩人），南非的受艾滋病（HIV）感染的人，更不用提伦敦和东京的股票经纪人，都感觉到了他们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正在地球上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件。“全球化”的概念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共享的词汇，来表达这种联系在一起的感觉——尽管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完全可能有理由对这个词和它所传达的意义，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根据各种情况，某些人认为自己得到了解救，并为新的经济或社会发展的机会而兴奋不已；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越来越觉得受到威胁与无能为力。

本书的目的是探索能够促进全球化的积极方面的各种途径，同时控制其各种有害的影响。本书的作者集中论述了经济的全球化，并且承认它有可能成为一股有利的力量，但他们坚持认为，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市场力量受到一个能够确保社会的持续性和正义性的政治框架的抑制和平衡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

## 全球化：一个有争议的现象

全球化并没有正在取代传统的社会冲突和合作的路线，而是在重新描绘它们。雇主和工联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污染者，土著民族和跨国公司，女权主义者和男性沙文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自由贸易的商人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人权活动积极分子和专制的统治者，民族主义者和多边主义者，“北方”和“南方”：所有这些集团都已发现，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的能力，都因为“全球化的力量”，而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竭力想弄明白这种现象，去理解全球化对于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含义，有时还设法去影响它的进一步的发展——或者使它止步停顿。

“全球化”此词的广为流传，部分归因于它的词义上的模棱两可，以及取决于谁在使用与用在何处，而且有不同的含义。当然，经济全球化不乏支持者。它一般被定义为，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卷入洲际间的贸易和投资网——也可以简单地称之为“世界市场”中去。支持者们称赞全球化，因为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个人，既作为消费者又作为生产者，能够享受经济自由化、竞争和创新的好处。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越来越多地接触跨国交流的潮流，将导致人们跨越文化疆界的障碍，实现更好的相互了解，趋同于“天下一统”的价值观——如自由、民主、人权和（对某些人）私有的经济企业。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以及富裕的“北方”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已具有一种十分有威胁性的意义。<sup>[1]</sup>这种信心的缺乏或彻头彻尾的敌视有多方面的原因。经济的开放使工人和公司置于来自国外的

---

[1]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2).

不受欢迎的竞争之中，增加了公司将把生产重新定点到别处的风险。受此消极影响的那些人能从反对全球化中得到他们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其他人则担心，各个地方对流动资金的竞争有可能导致环境标准滑向底部的竞赛。对全球化的敌视也有可能出自对外部世界的本能的缺乏自信，或害怕由于文化被标准化的结果，一种他们珍爱的或独特的生活方式将注定要消失。在所有与全球化有关的可能的关注中，从一种进步的观点看，有两种似乎特别重要：害怕全球化正在侵蚀民主体制，以及认为它加剧不平等和非正义。

## 经济全球化：对民主公民的威胁

民主公民的概念意指，政体是行使自我管理的人民的共同体。但是，为了使这个概念接近于真实的民主实践，影响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的社会生活的主要条件需要置于他们的集体的控制之下。<sup>[1]</sup>集体自治的条件包括控制经济范围：民主公民的标准概念认为，一旦不同的政治—经济的价值观和政策选择已经过公民的辩论，或者似乎更合理的是，经过他们的代表的辩论，经济的互动能够按多数人公开表述的意志调节。

当然，这种强烈的自治的理想还从来没有在实践中实现过，一点也没有过，因为大多数政体都被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互动之网缠住了，由此阻止了它们实现完全的自治。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中，似乎在富裕的西方世界有可能在民主的自我管理和国际开放之间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平衡，至少对于大多数公民如此。<sup>[2]</sup>在凯恩斯主义时代，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在决定调节

---

[1] 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95).

[2]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spring, 1982).

和再分配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享有相当大的活动余地。<sup>[1]</sup>在这福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机会多半限制在他们所在国家的国民经济范围内，竞争主要在同一国家内的公司之间展开。政府能够决定金融投资的回报率，并通过它们的利率政策，间接决定创造工作岗位的真实投资，而它们的财政和开支政策使它们能够影响累计的国内需求。这在公民和他们的代表中，树立起一种信念，以为他们有可能按照他们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爱好，塑造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完全不必舍弃一个生气勃勃的市场经济带给他们的益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观念发生了变化。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已经改变为：民主国家现在不那么能够控制资本的流动了，任何可能影响投资回报率的政策建议——利率政策、税收、社会和生态调节——鉴于资本抽逃或对内投资减少的风险的存在，不得不仔细加以考虑。从国际层面来说，并没有发展起充分的调节管理能力，来与资本、货物、人员和污染物的流动相匹配。<sup>[2]</sup>由于经济活动和政治控制的这种越来越大的空间上的分离，一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加快的分离，人们越来越难以在作为消费者与投资者或作为公民这两种角色之间作出抉择。作为前者，他们有可能因为较低的价格、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收入机遇，从全球化中得益；而作为后者的公民，由于集体自治的机会日益减少，他们冒的风险越来越微不足道。

诺伯托·鲍比奥(Norberto Bobbio)指出，民主要求“那些被要求作出决定，或去选举那些将要作出决定的人，必须给予真正的选择，并且有权作出抉择”。<sup>[3]</sup>今天，大家有一种广泛的担心，民主正在“空洞化”：形式上，民主的机构和程序依然如故；而实质上，由于国际

---

[1] Fritz W.Scharpf, *Governing in Europe: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6.

[2]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Polity, 1999).

[3] Norberto Bobbio,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1987), p.25.

市场强加的限制和投资者威胁“退出”，可能的选择范围已经缩水。<sup>[1]</sup>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高度流动的经济力量是民主的一个问题。已经有人论证过，“在某种意义上，资本市场，在无数的投资者和借款人的决定的驱动下，是高度的‘民主的’。它们就像24小时滚动的民意测验。况且，它们还通过使投票人更了解政府的表现，而增加政治家的责任。”<sup>[2]</sup>但是，许多人，不仅仅那些媒体称之为反全球化的积极分子，都将反对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结论，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人们所希望的作为投资者的特定角色，完全可能与他们作为公民的角色不协调，也就是说，在他们考虑更广泛的价值观和利益之时。第二，个人之间的经济资源的分配是如此的不平均，以至于将由此产生的“投票权”称为民主，几乎毫无意义。各种各样的作者都已指出，经济全球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比乐观主义者所断言的更成问题。<sup>[3]</sup>

## 全球化：社会正义问题

世界不同部分之间的物质福利水平悬殊惊人。足够幸运的出生在

---

[1] 关于可行的政策范围萎缩的经验性证据——特别是福利国家援助的紧缩——并不清晰。有些人争辩说，贸易的高开放性和资本的高流动性的结合，会趋向于减少社会保护：例如，参见 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其他的人则说明，具有“右的”政治机构的国家——最明显的，包括选举机构和社会公司主义在内——能够抵抗全球化的向下的压力：参见 Duane Swank, *Global Capit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in Developed Welfare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Geoffrey Garrett and Deborah Mitchell 论证了，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的成员國中，更多的国际贸易（但不是外国直接投资或从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等于是减少福利国家的慷慨度，但此效应并非特别强烈：参见 Garrett 和 Mitchell, “Globalizatio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载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9(2001)。Nita Rudra 已经指出全球化导致在欠发达国家地区中的福利国家援助的紧缩——但是，强大的劳工权力和民主能够抵消这种向下的压力，Rudra,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welfare stat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载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 (2002)。总之，可以得到的证据是交叉的，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模棱两可的。

[2] Jason Alexander, “Power politics (a survey of the world economy)”，载 *The Economist* 7 Oct. 1995, p. 44. Jan Zielonka 在 *Explaining Europaralysis* 一书中引用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1998), p. 173。

[3]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Daniele Archibugi (ed.), *Debating Cosmo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3)。

西欧的儿童，比起出生在非洲许多地区的儿童，有更多的机会长大成人。一个人达到物质的富足和其他优势的机遇，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或她碰巧生活在什么地方。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如此武断地分配生活的机会，代表了我们时代的主要道德问题。然而，人们对于不同社会的机会的不平等和全球经济关系的深化之间的联系是有争议的。首先，目前全世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正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仍在辩论之中。在本书中，罗伯特·韦德指出，答案取决于全球不平等如何定义和测定。此外，辩论的问题还有，就经济增长来说，落后的国家仍旧贫穷，是因为它们参与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网络，还是因为它们参与全球经济不够。换言之，贫穷是全球化还是边缘化的结果？世界银行等断言，一个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与它的经济业绩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一种其他的分析家已经提出了疑问的联系（见本书韦德的文章）。

究竟全球化是加剧了还是减少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由于许多原因，影响到每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正义的追求。进步的政治力量常常坚持一种社会正义的概念，这种社会正义的概念的宗旨已由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作了如下的阐述：社会的和经济的的不平等是允许的，但只应以符合社会的最不利的成员的最大利益为限。<sup>[1]</sup>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维护最不富裕的人的福利可能需要对流动的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和高度熟练的劳工）提供更多的刺激和报酬的政策，因为他们的离去或不进入可能损害国家的经济业绩，并间接地损害社会的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成员。由于全球化，一个愿意保护在其管辖下的最易受到伤害的成员的政府，可能被迫容忍其公民中的越来越高程度的不平等。<sup>[2]</sup>中间偏左的政党和政治运动传统上考虑将执行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视为提高公平的一种途径，但是，全球化在追求平等与追求正义之间引发

---

[1]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 Philippe Van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27.